论张恨水小说中抗日军人形象的崇高美

燕世超

张恨水在其庞大的小说群中塑造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在这样一个琳琅满目的人物画廊中，军人形象是较为突出的部分。他在抗战时期对军人形象的主体态度与过去迥然不同。张恨水直接塑造抗日军人形象且有较为重要价值和影响的小说虽然仅有几部，但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抗日军人的崇高美。本文拟从他对军人形象主体态度的转变入手，探析其对抗日军人形象崇高美的深度体验和艺术追求。为了论述的需要，本文还会引用其他作品作为旁证。

主体态度的转变

应该说，张恨水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作品如《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银汉双星》《啼笑因缘》和《满城风雨》中，对军人形象一般是取贬低态度的。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大多采用漫画式的手法，描绘出军阀兵痞语言粗俗、行为粗野，搜刮民财、一掷千金，玩弄女性、淫荡不堪，飞扬跋扈、草菅人命的丑恶面目。这种态度的形成有其明显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原因。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政治黑暗、官场腐败。而作者早年由于生活所迫，曾辗转各地求生，饱尝人生的苦难。譬如在1917年，他与好友郝耕仁曾计划一同浪迹江湖，考察民情，北游江苏、山东，直抵燕赵。可是由于中途遇到军阀混战，只好半途而归，张恨水还为此写了一篇小说《半途记》作为纪念。也许就此埋下了对军阀恶感的种子。1919年他到了北京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这使他能够了解许多社会信息。战争使人民流离失所，无数生灵涂炭，自然也加深了他对军阀的痛恨。然而在《太平花》中，这一态度已有较为明显的转变。这篇小说连载于1931年9月，1933年3月结束。小说前7回描写了军阀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着鲜明的反战思想。恰逢“九·一八”事变后，作家便从第8回起改写为抗敌御侮。《弯弓集》是这一转变的最明显的标志。该书写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其中的小说、诗歌和笔记等全是以鼓动抗日为主题。作家大声疾呼，慷慨激昂，描写英雄事迹，抒发抗日豪情。从时间上说，它大概是中国第一部抗日作品集。但真正深入到主人公内心世界，描绘其丰富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的应该是始于1933年《东北四连长》（又名《杨柳青青》）。作家不是正面抒写抗日战场上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而是借英雄走上战场乃至牺牲后家人的生活困境和极度悲伤来渲染日寇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从而激发人民的抗日热情。这种主体态度的变化应该还有作家个人的原因。一是作家青少年时代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培养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这从他在安徽芜湖《皖江日报》工作时的一段人生经历可以得知。“五四”运动发生不久，曾有一对日本兵在该市示威，并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的口号。张恨水毅然率20多名同事沿街游行以示抗议。二是张恨水出身于军人之家，其祖豪爽豁达，武艺高强，作过清朝参将，曾寄希望于张恨水能够继承他的事业。虽然由于其祖过早辞世，没能如愿，但张恨水却常以此为荣，自诩为“将门之后”。这使其从小便产生英雄情结。到了抗战爆发，这一情结便显得十分突出了。由此看来，这一转变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时代的要求和作家的英雄情结双重作用的结果。

人格世界的理性美

与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明显不同的是，他的抗日小说处处洋溢着理性美。这不是说他的这类小说不写人的情感，恰恰相反，他总是把情感和理性结合起来，写出抗日军人在情与理的冲突中艰难的抉择。它大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欲与理的冲突。小说《大江东去》的主人公孙志坚奉命参加南京保卫战，把爱妻薛冰如托付给挚友江洪照料。江洪尽心尽责，一路呵护薛冰如，经受千辛万苦，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没想到薛冰如移情别恋，对自己百般讨好、挑逗、诱惑。一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在月光皎洁的夜晚，面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的主动追求，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情欲的；再加上南京保卫战早已结束，自己的朋友已是凶多吉少，不存在道德方面的自责。两人由两情相悦，到同居结婚，本属顺理成章的事。但江洪作为军人，终于没有受制于情欲，而是以友谊和国家利益为重。后来志坚大难不死，逃出南京，然而冰如决心已定，仍不顾家人反对，毅然离婚。小说并没有以薛冰如与江洪结婚而告结束，而是宕开一笔，写出江洪与志坚抛开儿女私情，并肩走上抗日前线，抒发了英雄的豪迈之气。冰如的感情有其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可作为军人的江洪与志坚理性战胜了情欲，其崇高的人格世界得到凸现。生命的原欲是人与动物的共同特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在这里体现为理性战胜了本能，这正是崇高人格的一种体现。《大江东去》无疑印证了这样一个真理，人类能够“战胜自身内部的自然。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必然带有自然属性，这就是人的动物性的本质和欲望，即饮食男女之类。人类在以精神力量战胜自身内部的原始冲动，战胜动物性的欲望时，就能产生一种自豪感，迸发出某种形而上的理性冲动和激情，把自己从其他造物分离出来……”（1）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生命的原欲与理性交织，构成世界历史的“大地毯”，但二者相比，理性更重要。“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本性。”（2）二是情与理的矛盾。《东北四连长》中杨桂枝与赵连长结为夫妇，然而孩子出生不久，赵连长在前方牺牲。小说尽情描绘了桂枝内心的巨大痛苦，写军人年迈的父亲将要面临的凄惨的晚年。在极力渲染这种悲苦气氛时，小说引发出一个沉重的话题：赵连长生前难道没有想到过，假若自己战死，会有这么一天？小说没有正面写出英雄的心理活动以及牺牲的壮烈，然而通过这种侧面描写却起到了正面描述所无法达到的效果。作家就是通过英雄家人痛苦心理的渲染，烘托了英雄在常人看来难以企及的人格世界。康德说，“崇高是与之相比一切别的东西都是小的那个东西。”（3）它“震撼人心的力量，有一种奇特或惊人的性质。”（4）

生命极限的壮烈美

张恨水小说中抗日军人形象的崇高美不但表现在情感、本能与理性的巨大冲突中，更表现在生与死的抉择中生命的壮烈美。当然，上述情感、本能与理性的冲突也能够表现出一种壮美，但这还不是在人生的最关键时刻，不是在生命面临最严峻考验的时刻。在生死抉择的关头，才最能够显现出英雄气概。正如朗吉努斯所言，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5）又如康德所言：“每种具有英勇性质的激情（也就是激发我们意识到自己克服一切阻力的力量的激情），都是在审美上崇高的。”（6）张恨水小说中抗日军人形象所体现的就是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伟大心灵，它表现出一个人的生命在超越自身极限时所焕发出的壮烈美。这种壮烈美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体能和精力等）到达极致时的所作所为。《大江东去》第14回“炮火连天千军作死战；肝脑涂地只手挽危城”描写了中国将士在血肉横飞的南京保卫战中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壮烈场面，后一回描写了南京失守后日本军队屠城，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惨状。这也许是当时唯一一部正面描写南京大屠杀的抗战小说。在对历史的几近真实的记录中，张恨水也尽情抒写了主人公孙志坚在缺衣少食、体能几乎耗尽的情况下，从尸骨堆中挣扎着逃出虎口的惊险场面。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小说都会让我们感受到一股弥漫于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股浩然正气不会因生命的毁灭而消失，反而在生命结束后让后人更加感受到死的伟大，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二是一个战斗群体在面临生死存亡时所表现的生命极致之美。《虎贲万岁》作为一部纪实小说，写的是湖南常德保卫战这一史实。国民党的一个王牌师在师长余程万的率领下，奉命保卫常德。在数万日军的围攻下，全师8千多人苦战几昼夜，打退日军的多次疯狂进攻，终于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最后常德城被炸成一片废墟，全师仅生还83人，而日军付出的代价更大。如果说，个体生命所表现的壮烈美已足以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强力和庄严，那么群体生命的共同毁灭则意味着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内在的磅礴气势和潜在的威慑力。如果说张恨水通过一个个体战士的死里逃生抒写出一曲生命的颂歌，那么它通过一个战斗集体的视死如归则把那段历史凝固了起来，雕成一尊巨大的塑像，显示出几不可测的强力之美。在点与面的结合中，张恨水完成了对英雄崇高之美的多视角和多层次塑造。

形象世界的深度美

康德说：“真正的崇高不能包含在任何感性的形式中，而只针对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虽然不可能有与之相适合的任何表现，却正是通过这种可以在感性上表现出来的不适合而被激发起来、并召唤到内心中来的。”（7）在张恨水所塑造的崇高的抗日军人形象世界中，无疑有着可以称之为深层的“理性的理念”的东西，这就是具有文化底蕴的深度美，它反映了作家对现实社会和本民族文化的严肃的思考。首先，在作家看来，真正的英雄大多来自普通民众。小说《丹凤街》以车夫童老五与秀姐的爱情为主线，描写了官僚赵次长利用金钱和权势霸占了秀姐，丹凤街上的穷弟兄们为了营救秀姐，竭尽全力却无功而返，秀姐被送往上海不知所向。战事日紧，这些穷弟兄们都参加了军训，准备迎敌。作家在1943年写的该书序言中称赞道：“舍己救人，慷慨赴义，非士大夫阶级所不能亦所不敢者乎？友朋之难，死以赴之，国家民族之难，其必溅血洗耻，可断言也。”有全国民众的参与，“将不患与倭人一战矣。”（8）在作者看来，能否取得抗日胜利，关键在于民众的参与程度，而支撑民众抗日的根基在于传统文化中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正义感。这可以说是张恨水一贯的思想。在1933年所作的《啼笑因缘续集》中，作家讴歌了生活在社会最下层、行侠仗义的关氏父女毅然抛开私情，参加义勇军，在与日寇搏斗中不幸阵亡的英雄精神。联想到作家在其他作品中对主人公仗义执言、扶弱锄强等其他崇高品德的歌颂，可知这一思想是较为系统的。其次，随着抗战事业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鲜明对比迫使作家对中国文化做出沉重的思考。在过去的创作中，作家从来都是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上流社会，批判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是非颠倒的根源就在于上流社会的昏庸无能和腐朽堕落。在其抗战小说中，这一主题得到深化。他生动地描绘出抗战经年持久的原因所在。《巷战之夜》（又名《冲锋》，《天津卫》）刻画了主人公张竞存从一位小学教师成长为抗日英雄的历程。小说最精彩之处在于快要结束时，英雄回到了大后方，夜晚在一个小巷中走路时，听到哗啦哗啦的洗牌声。“朋友笑道：‘你看，这巷战如何？’竞存笑道：‘隔巷对峙，夜战正酣吧？’”后因无意中挡住了贵妇人的轿子而遭到其卫士的痛打。小说结尾处写道：“竞存觉得今年今夜，虽没有前年夜间的慌乱与恐怖，也没有去年的严肃与紧张，可是精神并不安宁。他久久地望了月亮，心里想着，你照见过前年今夜的巷战，也照着今年今夜，不算巷战的巷战。一切瞒不过你，你知道人世间是怎么回事？”（9）这篇小说就其思想的深度上应与史诗般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深刻地反映了抗战的艰难可能并不在于和日寇的殊死搏斗，更在于民族自身的战争：不战胜自我，不克服本民族内部的弱点，不清除自身内部的毒瘤，它就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作家还进一步对本民族文化素质进行深入剖析。在过去，作家除了对小市民的市侩气进行讽刺和嘲笑外，总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为下层百姓说话，写出其生活的辛酸与种种不幸。但其《巴山夜雨》却是一个例外。小说描写奸商昧着良心发国难财，描写文人的无聊与庸俗，也描写了工农群众觉悟低下，见利忘义，麻木不仁。大敌当前，每个人都不思抗日救国，而是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这样的民族又怎能打败侵略者？张恨水从青年时代就追求名士气，对知识分子不无好感。然而在《巴山夜雨》等小说中，他对知识分子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大敌当前，这些文人们整天热衷于闹桃色事件，打听他人隐私，打麻将，做那些碌碌无为的无聊之事。在此之前，他已在其他作品中对国事危机，许多文人仍陶醉在风花雪月中感慨万千，“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牛马走》（又名《魍魉世界》）中，他塑造了一位出淤泥而不染的教育家庄老太爷的形象。面对眼前魍魉横行的世界，庄老太爷坚守着“君子固穷”的处事原则，一花独秀，宁折不弯，显示出人格世界的崇高美，与抗日军人的光辉形象相得益彰。在《傲霜花》中，作家有意把一群知识分子置身于要么病饿而死，却能够保持高尚的人格与尊严，要么随波逐流的选择中。作品塑造了一位朱自清式的人物——科学家谈伯平，面对周围的朋友纷纷改行，入仕或经商，他伟岸不屈，最后在华小姐与夏先生的结婚喜庆中病饿而死。无疑，作家在谈伯平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同时也掩饰不住对其曲高和寡、身后寂寞的无奈和对祖国前途的渺茫之感。这样，他笔下的抗日军人形象就自然成为其主要的希望所在了。

注 释：

（1）曹俊峰《康德美学引论》第262页，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

（2）黑格尔《小逻辑》第80页，商务印书馆1980。

（3）康德著，邓晓芒译《判断力批判》第88页，人民出版社2002。

（4）曹俊峰《康德美学引论》第102页，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

（5）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第12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6）康德著，邓晓芒译《判断力批判》第113页，人民出版社2002。

（7）康德著，邓晓芒译《判断力批判》第83页，人民出版社2002。

（8）张恨水《丹凤街·自序》，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9）张恨水《冲锋》第86－8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燕世超，男，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